



Troubling American Women:

Narratives of Gender and Nation in Hong Kong

“惹事”的美国妇女 ——香港的性别与国民记叙

(美) 福史德 (Ford, S.) 著

李俊飞 译

“惹事”的美国妇女

——香港的性别与国民记叙

(美)福史德(Ford, S.) 著
李俊飞 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Troubling American Women: Narratives of Gender and Nation in Hong Kong ©
2011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香港大学出版社授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独家出版,并在全世界发售。未经香港大学出版社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惹事”的美国妇女——香港的性别与国民记叙/(美)福史德(Ford, S.)著,李俊飞译.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622-7110-9

I. ①惹… II. ①福… ②李… III. ①妇女—社会认知—研究—美国 IV. ①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2843 号

“惹事”的美国妇女——香港的性别与国民记叙

©李俊飞 译

责任编辑:蒋茹茹 刘晓嘉

责任校对:王 炜

封面设计:胡 灿

编辑室:高校教材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426/678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鑫昶文化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字数:198 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1.5

版次: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致谢.....	1
引言:女性、国家和跨文化接触.....	3
第1章 “美国女孩”三幕剧:19世纪澳门和香港的文化接触故事	15
第2章 “我身处战争中期,我正值事业中期”:女性、战争和国民身份认同	46
第3章 “美国的另一个声音”:冷战时期香港女性演绎的国民性.....	83
第4章 主权移交之家:跨国界时期温和的例外论	113
结语.....	144
注释.....	147

致 谢

本书虽薄，耗时却久，且一直得蒙多方襄助。我首先想感谢 Colin Day, Michael Duckworth, Christopher Munn, 以及香港大学出版社许多不知姓名的读者和优秀团队。在我撰写本书的最后阶段幸得 Christopher 的到来，他耐心、体贴且不惜花费大量时间为我提供了不少历史知识和见解，这实在是意想不到的恩赐。特别感谢 Dawn Lau, Jennifer Flint, Dennis Cheung, Ada Wan 和 Serina Poon 的编辑、设计和出版工作为本书（英文原著）增光添彩。

我有幸在香港大学历史系和美国研究课程班任教近二十载。我要感谢香港大学的同事和学子，他们为我花了不少精力并提供批评建议，特别是 John Carroll, Kit-ching Chan, Patricia Chiu, Peter Cunich, Marie-Paul Ha, Petula Ho Sik Ying, Karen Jo Laidler, Gina Marchetti, Carolyn Muir, Norman Owen, Robert Peckham, David Pomfret, Priscilla Roberts, Maureen Sabine, Gordon Slethaug 和 Tome Stanley 等人。来自香港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一些朋友，尤其是 Barbara Clarke, Kavita Mathai, Nicola Nightengale, Evelyn Ng, Veronica Pearson 和 Geetanjali Singh, 促使我更为细致而全面地考量中国香港、亚洲以及更广地区在性别、族裔、文化、阶层和国民认同之间的关联性。

本书作者得以澄清思路并能找到新视角都受益于许多人提供的重要见解、交谈以及学术支持，为此我要感谢 Larry Adam, Iska Alter, Jill Andersen, Kathy Beckstead, Julia Chang Bloch, Megan Bowen, Eileen Bradford, Cindy Butikofer, Marissa Carino, Anita Chan, Nayan Chanda, Kingkok Cheung, Carol Collins, Deborah DeSimone, Tina Espinoza, Sheila Forte, Cora Fung, Carrie Gammons, Sheri Garber, Maghan Garcia, Nic Gisborne, Clyde Haulman, Susie Henrich-Jabal, Nan Hodges, Susanna Hoe, Pamela Holliday, Gerald Horne, Richard Horwitz, 已故的 Lena Kan, Paul Kan, Alicia Kershaw, Ellen Knell, Susan Kuyper, Crystal Kwok, Derek Lam, Miranda Lam, Russell Leong, Teri Leuchtefeld, Gary Lew 和 Lily Lew 夫妇, Gary MacDonogh,



Felicia Man, Kristie Marsden, Sarah Nelson, Teresa Norton, Siri Osthed, Kim Philips, Beverly Rubin, Taunalyn Rutherford, Audra Sbarra, Damian Shaw, Elizabeth Sinn, Laura Sirtonski, Max Skidmore, Mary Slethaug, Audrey Slover, 已故的 Carl Smith, Pam Smith, Leigh Stevens, Christopher Stevens 和 Shanadee Stevenson 夫妇, Leslie Stone, Michael Streefland, John Sword, Astrid Tuminez, Janet Van Cott, Kim Wade, Helen Wang, Rosemarie Wank Lamas, Katherine Webber, Robert Webber, Virginia Hopper Webber, Betty Wei, Jan Westrick, Grace Wong, Jason Wordie, Weibin Zhu 和 Wendy Zierler 等人。

在写作各阶段我有机会出示本书手稿的部分内容并得到宝贵回馈，为此一并感谢哈特内尔学院（加州的萨利纳斯）的学生，达特茅斯美国研究的未来短训班的同事（尤其是 Donald Pease 和 Elizabeth Dillon），都柏林大学克林顿美国研究院暑期课程班的 Liam Kennedy 和学员们，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的蔡明发和相关学者，在华美国研究联络会的张之香女士及其他成员。

我要感谢为本书全部或大部分内容提供详细评论的朋友，他们是 John Carroll, Karissa Hazy, Gina Marchetti, Carolyn Muir, Eileen Scully, Geetanjali Singh, Gordon Slethaug 和 Jason Wordie 等人。还要感谢 Ford, Hosford 和 Burgon 家族的成员，与他们的生动交谈丰富了我的思维角度。我要对 Hosford 一家的 Matthew, Tyler, Ian, Crystal 和 Noah 表达谢意，他们曾给予慷慨帮助、深刻见解，一些“共享时光”和真实性检验。Matthew 为本书的撰写作出了持续而多方面的贡献。本书奉献给我的父母，他们没等到书稿撰写完毕就离世了。感谢父母对我的爱和榜样效应，并对父母报以无限思念。

本书的最终完成得益于在此提到的各方支持，而如有任何纰缪之处概由本人负责。

引言：女性、国家和跨文化接触

一国的名誉取决于该国妇女的性格，因其支撑该国人口的一半，甚至更多。就此而言，美国则地位卓著。美国妇女活泼开朗，且坦白率真；她们也是无畏而自立的，没有什么能拘束她们。对于任何人，不论地位高低，她们都是很容易接近的……对于陌生人，尤其是东方人，她们就如难以捉摸的谜题……美国妇女在某些方面与他国女性截然不同……她们具备轻松而智慧地驾驭任何话题的能力，显露出全方位的教养……极端地坚持己见……如果说美国妇女有任何缺点，我发现只有一样，那就是喜好打听；虽然女性都免不了如此，但美国女性在这方面尤为突出……

《一位东方外交家看美国》伍廷芳（1914年）

本书分析了多位19世纪和20世纪在香港和澳门居住了相当长时间的欧裔美国女性、华裔美国女性和一些“美国化”了的华裔女性所作的经历叙述，一个由回忆录、日记、书信、日记体随笔、小说类作品、访谈和胶片形式汇集而成的资料库。该研究强调跨文化接触能够以多种方式使妇女重新考量其国民认同感，并尤其关注民族、性别与族群认同、文化性迷思和意识形态以及历史背景之间的关联。该项研究关注的是美国妇女精神和美国特性在亚洲的表现，然而在开篇我们没有选择一位美国女性，而是选用了某位中国男士的一段文字作为预备性陈述。尽管在伍廷芳于1914年出版该书的时候美国妇女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近一个世纪，他还是特别强调中美文化接触过程中性别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他曾指出，女性以某些方式在个体和整体上被视作文化的负载者和传统的守护者。他还认为，旅居国外的美国妇女所接触的那些人早已对其抱有成见。

伍廷芳的书揭示了代际与国际间的深刻历史关联，而他的经历也验证了在本次对于妇女叙述的研究中一再重现的更为广泛的文化接触主题。出生于新加坡这块曾为英属殖民地的伍廷芳原是英格兰的一名出庭律师（barrister），在去中国大陆之前曾移居香港并取名伍才，在当地司法和商



界精英阶层颇负盛名。在 20 世纪初的美国，他作为一名外来者，凭借其财富和背景，应该可以在美国排华运动期间免遭一些歧视。不过他也可能熟知在中国香港、美国及西方世界其他地方盛行的反华情绪，并对此颇为敏感¹。他在世界各国的关系网络和跨越国境的社会活动中都暗示出“华人属性”的多重性应得到很大程度的关注，而这也使伍廷芳置身于学者所认同的与散居华人华侨相关联的一系列人群、产物和观念的洪流。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伍廷芳的一生完全与“中国苦力”这样一群模式化的华人形象背道而驰，也与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东方学者惯用的描述迥然不同，他却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构建了东方人眼中美国妇女的模式化形象（stereotypes）。在本文开头的那段引文中，伍廷芳可以说是对美国妇女极尽溢美之词，诸如“无畏”、“坦率”、“自立”以及“纯洁而高贵的性情”。同时，他还强调美国妇女“极端坚持己见”，甚至令人惊讶地把美国妇女说成是“难以捉摸的谜题”，而实际上西方人普遍认为恰恰是中国人才让人难以捉摸。尽管美国妇女在很多方面都值得称赞，然而在伍廷芳看来，“没有什么能拘束她们”，而且“太喜好打听”（伍廷芳调侃说这是女性共有的一个缺点，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那个时代，大洋两岸的东西方妇女正日益扩展其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而伍廷芳的一席话则微妙地表露出她们给世人留下的印象。

对我（笔者）来说，伍廷芳的话让人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也见过他所描述的“那类女性”（我偶尔也能被归为此类）。她们用言语、肢体语言和行为举止来“为美国风格提供编码”，而其方式即便不总是那么明晰亦仍可察觉（只需要说“她是十足的美国范儿”就足够了）。当她们义愤填膺地谈论各种问题时显得格外自信，丝毫不注意他人的反应。尽管她们勇气可嘉地指出周遭不公平的大事小事，但对于自己所持有的判断、种族观念、偏见或特权等思想都流于草率。她们的身影也随处可见：学术研讨会、教室、董事会和各种社交场合，如儿童运动会场的边线区、大餐派对或香港地铁。

不论是“滔滔不绝地”大谈道德，或是提出让人不快的话题，抑或是表现出一种美国式的权力感，她们都在表达一种善意，但同时，就像我一个年轻同事所说的，她们也“很难伺候”。尽管美国女性的体形和肤色不都一样，但印象中最符合以上描述的大概就是美国白人妇女了。有些女性告诉我，她们对于此类行为抱有戒心。曾有一位来香港大学访问的学者（教授）声称，她先前了解到不应该和任何同事，尤其是男性，发生言语



冲突，因为害怕被标榜成“专门惹事的美国女人”。

虽然部分美国女性被认为是“制造麻烦的”，或是表现出“招惹他人的”行为，但本书书名中的“惹事”一词在笔者看来具有一语双关的功用。而另外一层含义在于，撰写该书的目的也是想“招惹”一下我们的读者，希望我的这项研究能够激发大家反思两个概念：一个是传统上人们对于美国女性的看法，另一个是充斥于香港历史和社会中的所谓“美国性”。鉴于此，有时候仅仅通过归纳的方式来认识“美国女性”显然不得要领。那些归纳或许只是反映了大众文化中的美国妇女，或是处于若干非美国文化背景的公式化的美国人形象，抑或反映了归纳者本人的特质。我在香港生活将近20年，同时在香港大学讲授美国历史、女性历史和美国研究，其间从各种不同途径了解到许多类似伍廷芳先生的论断。比方说，在聚会或其他社交活动中常常会听到有人滥用性别和国籍来描述最适合或最不适合结婚的女性。而美国妇女往往被取笑为排名最后的。某些中英文报刊社论有时候会登载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些或明或暗的挖苦之词，诸如她不愿听命于男性政客，喜欢问太多问题，以及惯于训导而不爱倾听等毛病。

我的一些——尤其是来自香港本地或中国内地的——学生对于“美国女性”具备的某种风格表现出艳羡。她们衣着或时髦、或花哨、或随意，而面对生活亦充满自信。然而她们也常被斥为过于直言不讳、有攻击性以及太过独立。尽管很多学生明白好莱坞影视作品所施加的潜在影响力（像《老友记》《绝望的主妇》和《欲望都市》都是最近很流行且很有影响力的影视作品），但他们还是认为自己对于“真正的美国女性”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不管怎样，他们很确信地告诉我，香港是个繁华的商业文化中心，在这里可以频繁地观察并与美国女性打成一片；他们或为旅客，或为交换生，或是那些因为旅游、教育或移民而日趋“美国化”者的亲朋。不论在职业场合或社交场合，美国人给他们大多数人的印象总的来说是更愿意“表白”、“直言”。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注意到美国女性只要一有机会就愿意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而中国女性却不太愿意如此。

一位前美国商会主席如是说，他在任期内越来越感觉到：在香港生活的女性，尤其是美国女性，通常比其男性同胞“过得更为艰难”，因为这里的社会往往期待她们要“低调处理其美国人的风格”，服从于某种“和谐”而不要表现出直接对抗。虽然他并不幻想美国会完全杜绝性别偏见，但他很确信香港社会对于那些被认为过于自信或太直白的美国女性和其他



西欧女性是存有很大偏见的。他认为，在香港的华人女性和美国女性都对工作场合的性别偏见司空见惯，但华人女性却不大愿意说出来，或不想去“教训”那些男性同事。当然，人们对于香港社会存在的性别和国籍方面的感知差异也有诸多不同的反应。有些美国人认为，相比美国，香港的这种“和谐至上”的风尚是令人惬意的。男性们看起来更容易适应当地的规矩，有些人会害羞地（或得意地）承认：在香港工作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们不需要像在“家乡”那样对性别问题总有一种保持“政治上正确”的心理压力。

类似的看法也在其他地方流传。最近在参加新加坡的一次会议时，我听到一位刚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韩国女孩说，她的父亲很失望，因为她在留学归来后并没有学会“像美国人那样行事”。他在公司里的经验让他确信，“如果是一名美国女人领导一个谈判队伍，那么谈判就意味着结束了”。尽管他也反感这种一边倒式的谈判，但他仍然希望女儿在美国期间能够沾染一点自信的风格。有一个在亚洲做审计的朋友一直很迷惑，尽管她不轻易与人发生冲突，但仍被视为“疯狂的女权主义者”。当她大胆指责同事表现出的性别偏见时，常常会被训斥为像“那些美国女人”那样试图“改变整个世界，一点一点地改变每个男人”²。一位对我的研究有所了解的日本友人希望我可以解释为什么她认识的许多美国女性——不论是在中国香港、日本，还是在美国——总看起来想要“教会她”什么，而她其实只想随意聊聊天。

而在香港的华裔美国女性在性别和国民身份方面可能会遇到特别的麻烦。我的白人面孔有时能够确保当我哪怕说出一丁点汉语，对方就会对我报以某些赞许或至少表示出愉悦和亲近。然而，我认识的一些在美国出生的朋友、同事或学生，只要不能完全做到双语交流的，大多都会由于对方不能透彻理解而报以轻视。他们虽然在香港的某些场合比我更容易“过关”，但也免不了遭受我可以逃脱的一种苛刻和批评的态度。我的感受不仅仅是通过作为一名“在国外的美国人”的亲身感受而形成的，更是得益于多年来的阅读和调查，这些都让我深知对于任何人群或民族作出简单归纳会带来危险。近年来，美国研究和美国历史研究领域发生了一些变化，学者们呼吁抛弃民族的视角，转而采用跨民族和概念比较的理论框架。我在这方面的处理方法是，在应对前述的那些疑问和归纳方式时留意一些特例以及模式化形象带来的危害。毕竟不是所有“惹事”的美国妇女都符合这一模式化形象。那些同样“惹事”的美国男性和非美国籍的女性



呢？虽然毫无疑问有不少美国女性像我朋友描述的那样有着“一副教训人的口吻”，但也有很多不是这般。

实际上，正如前述，许多在香港的美国女性谈到她们正努力掩盖其“美国特征”，并试图改变美国人特有的一些行为习惯、表情和姿态。那些持有美国护照和香港永久身份证件 of 香港常住居民对于“举止如美国人”的新来者总是持敏感态度。这些香港居民可能也时不时表现出“美国人”的特征，但他们对于国民认同的看法一般都与新来者有着本质的差别，或者——套用卡洛琳·史密斯（Carolyn Smith）的话——“更具有弹性”³。对于在香港出生并已经获得美国护照的华裔女性来说，身份和文化归属问题会变得更为复杂。虽然她们可能在其他香港人眼里是“符合了美国特征”，或者她们自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美国化”了，但却常常不被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接纳为“局内人”（insiders）。

所有的印象和轶事当然都应该用一定的视角来考察。国民认同的观念都是经过建构的，是具有暂时性和流动性的，而且在具体情境中常常不被认为具有清晰的实体。对于香港社会稍有了解的读者都会清楚地认识到，生活在当代香港的美国女性通常一律被归为外国人或西方人的行列，而不是“来自”某个地方的人。但是在某些时候，国民认同问题也确实不容忽视。而我对于这类情况颇有研究兴趣，当然也包括历史上的先例。以此为目标，我的研究将审视历史上不同阶段在香港和澳门（预备再去香港）生活过的美国妇女和那些自认为“美国化了”的女性，讨论她们对国民认同以及一系列相关话题是如何思考，并有何言论的。我希望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读者能够把我要探讨的要点与其自身的叙述和观点联系起来。我还想强调，本书并不是一部关于在港美国妇女的历史书。尽管本次研究按照年代顺序编排，但只是选取了一部分女性的生活片段，以展示在不同历史背景影响个人处境和叙述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国民认同的观念是如何演化、转变或消泯的。

最后我想提的是，虽然美国女性在香港有时候被笼罩在模式化的形象中，但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显然是得到了香港社会很好的接纳，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享有一定特权。我们生活在一个富有活力的社会，它可以为我们提供饮食、文化和教育等各方面丰富的选择菜单。尽管在这个多变的时代仍潜藏着不确定因素，但我们当下在经济上的安全度还是远胜于我们来亚洲之前的情形。我们正在见证这样一座充满人流、充满产品、充满建筑项目的城市。随着 21 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我们尽可以坐在最前排的位子来



观察中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转变，还能够自由沉浸于各类信息、技术和娱乐活动中。值得称赞的是，香港的中国公民中有 95% 对于来自不同地方的非华裔“外国人”表现出容忍，只是白皮肤的西方人仍比来自西方或非西方国家的暗肤色“外国人”享有更大的特权以及更少的歧视。然而，正如本书将要指出的，特权也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诚如朱迪斯·布劳（Judith Blau）和埃里克·布朗（Eric Brown）所称，紧随威·艾·伯·杜波伊斯（W. E. B. DuBois）之后，“特权会限制感知力和社会良知”⁴。对此我想补充的是，性别和特权在个人方面有一定关涉。因此，本次研究有必要探寻特权是否会以及如何限制在港美国女性的感知力和社会良知的。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在男性和其他西方人那里寻求答案，不过那就是另外一项研究课题了。

构建一种接触：跨学科探究的方式

本书是一次在跨民族美国研究领域的尝试，或者说是研究世界中的美国。为了让这些女性所作的叙述能够与相应的历史时期和实际地点保持关联，我求助于诸多领域的学术资料和理论视角，如女性历史、美国文化史、后民族/跨民族美国研究、亚裔美国研究、香港历史/研究等领域。另外我还受益于其他领域的资料：后殖民和跨民族女性研究、流散研究、白人研究、叙事研究（包括旅行叙述）等。虽然我了解很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愿意用 America 来指代美国，但 America 和 US 这两者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一回事。因此本书中这两个词是通用的。

我作为在香港拥有永久居留权的正宗美国人的主体地位对于我理解上述学术文献是有一定影响的。我的亲身经历与我在跨民族女性研究和后民族美国研究领域的调查经历更增强了我对于文本分析中主体地位的意识。正如叙述研究学者莫莉·安德鲁斯（Molly Andrews）指出的，“一个人常常由于太沉浸于自身的民族文化，因此很难察觉其影响，除非有一天能够走出自身文化圈的范围”⁵。我想说的是，即使走出自己的文化圈也不一定能够提高察觉能力。我相信人们能够察觉到并且反思自身的主体地位和各种身份，但仅仅通过阅读文献是不够的。当然，我也不能保证自己可以绝对的客观，只是本着批评和同情的态度来解读女性所作的那些经历叙述。

本书研究还涉及一个更大的范畴，即对于美国人身份和美国文化的迷思与观念是如何在内部流传或如何在美国之外分布的。近年来，像美国研



究、性别和性研究、族裔研究、后殖民研究、旅行研究、流散研究等领域的文献都一再质疑和挑战美国例外论（关于美国的起源和历史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特殊或神启意味的观念）和美国民族性等观念⁶。套用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那句被大量引用的话，“民族是想象的团体，是构建出来的而非真实存在”⁷。无论如何，我相信仍有必要认真观察和分析国家和国民身份的众多故事是如何存在于人们想象之中的，是如何被争辩和借用的。另外，我也非常想去探究这些故事是如何与身份和关联的其他轴线互相交错和影响（或被影响）的。

需要澄清的是，我在美国例外论方面并不持有某种立场。我感兴趣的是探究作为修辞手段和历史事实的美国例外论这一观念。在这方面，我同意斯蒂文·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的论点。他说，总体看来：

美国人只是认为他们的历史才是全世界真正重要的历史。美国人的褊狭与其说是由于傲慢，不如说是源于一种认为他们的历史才是人类历史中心这一天真的信念。早在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强国和文化重地之前，美国人就把这种使命感深植于其民族性格里了。这条思想脉络连接了约翰·温斯洛普的“山巅之城”，连接了天定命运和近年来每一位美国总统关于美国是上帝拣选注定要成为世界之光的言论。把这些说法斥为粗俗的政治噱头的人显然是不得要领。⁸

当我们阅读这些女性讲述其跨文化接触的经历时，聆听她们讲述关于其自身、国家及其生活的“陌生”环境的故事时，我们发现她们的文字往往采用一种“教训人的口吻”，表现出我所称的“说教的冲动”。在某些时候，这种冲动混合了或者放大了某些例外论的言说。这并不令人惊奇，毕竟我们常说：一个人没有比他离开自己故土时更像一个“美国人”（或日本人、英国人等等）了。然而，事情也并非总是如此，偶尔也会出现偏离关于国家和国民认同的模式化观念的时候。有时还可能出现国民认同的重组以及反映其他方面的忠诚与归属感的新例外论⁹。为此，这种说教的冲动可以在多种背景下运用于不同听众身上。在这些经历叙述中，我们发现美国女性不仅仅会对“异国的他者”采用一种“教训人的口吻”，她们也可能对“家乡人”或者新近身处异国的同胞采用同样的口吻，特别是当后者需要一些生活指导的时候。

我希望表明，关于国家或民族的概念在香港和其他地方一样一直都很



重要，尽管这种概念有些捉摸不定或备受争议。关于国民认同的一些表现影响了一系列微观和宏观的跨文化交流，到今天仍是如此。可以这样说，香港社会自身塑造了其准国民的认同观，其中某些例外论色彩的叙述在部分上利用其他民族例外论的意识形态来描述香港何以与众不同¹⁰。

这里所涉及的两个领域应予以更多关注。其一，华裔美国妇女和在港的“美国化的”中国香港/内地的中国妇女的经历对于更宽泛地理解非美国背景下的美国国民认同是不可或缺的。有许多人的经历叙述都需要得到更为系统而持续的学术关注，而本书只能选取一小部分人。华裔美国妇女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香港和美国有时候处于一种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的地位。她们根据不同的情景和个人情况用多种方式来应对这一临界地位¹¹。我承认这一临界地位具有性别的维度，也承认其在香港历史的某些时候发生了转变或消失，不过需要说明的仍有很多。华裔美国妇女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肢解并重新定义了在美国和华人女性的模式化形象。

另一个我可以用最简洁方式探讨的领域是关于亚洲的美国化现象这一分散但很重要的探讨，尤其是20世纪的情况。本书的最后两章选择性地讨论了几类在香港的“美国影响”，但这一话题还需要在本学科甚至在跨学科领域继续加以探讨。在此我希望表明，美国化进程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具有同质性。美国化只是流行于香港公众领域的众多国家文化话语中的一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人从日本、韩国、欧洲，或中国内地以及美国接过了文化球杆。

说到这里，我相信有必要注意“美国文化碎片”是如何塑造香港社会的，当然是好是坏仍见仁见智¹²。同时重要的是比“碎片”更大更强的诸多影响力。美国例外论的话语和美国力量的势力范围曾经并一直明显地存在着。然而在21世纪的香港，就像该地区的其他地方，中国例外论却成为日益上升的话语。伊恩·泰勒尔（Ian Tyrell）指出：

美国并不是唯一声称例外论地位的国家。例外论实际上是19世纪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国家理念和民族信条构建过程中现代文明在特异性需求上的蔓延方式。因此例外论应该被视为一种理性过程，而不具历史现实性。¹³

妇女们的经历叙述展示了身份认同在民族、性别及其他方面的复杂关系。这里所考察的文本都是奇怪、片面的，并常常具有女性那种边缘化的



视角：作为女性，她们身处于一个男性占主导的环境（至少到 20 世纪末为止是如此）；作为美国人，她们置身于英帝国版图上中国人占主导的地盘。然而，某些特权影响了这种边缘性。实际上，许多美国妇女与其男性同胞一样，对于各类事情表现出自相矛盾的态度。一条贯穿该时期的主线思维就是对于英方态度的指责。然而，尽管她们批评英方殖民体制，许多美国女性却与殖民体制串通起来。另外，在种族和族裔身份上的差异使得美国白人关注的事情往往是那些华裔或亚裔美国人很少或根本不会关注的方面，反之亦然。这些妇女的经历叙述反映出不同身份认同节点和多极化反应之间充满动态和对话性的交涉：殖民/反殖民的、种族/反种族的、自由/反动的和精英/平等化的。

正如莫莉·安德鲁斯在其著作中肯定国民认同叙述的重要性时所说的：“故事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能做很多事。”¹⁴ 这些妇女的故事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澄清了跨文化接触是如何影响妇女在保卫、搅扰和重构性别、民族和帝国迷思方面所作的努力。在某些方面，它们显示出美国妇女仍在学习和了解他人是如何看待她们和美国及其领袖、政策、实力和文化的。她们的反应多种多样，有自卫性的，也有腻烦无所谓的。这些故事也可以说是汇集了各类话题的睿智而深邃的观察记录，也汇集了各种从惬意之地（comfort zone）出走到接触之地（contact zone）所引发的变迁故事¹⁵。不管是日常琐事还是风云巨变，她们的叙述都印证了帕特里克·甘·坎宁汉（Patrick Gun Cuninghame）所宣称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叙述的、多重的、协商的概念，它依赖于外部标记和符号，并且更依赖于‘他者’的存在来反映和划定私人——个人和公众——集体的边界”¹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知道他人对这里讨论的文本会作何反应，虽然那将是颇具启发性的信息。当然，我们可以从那些跨文化接触的经历中选择一部分并得出相关的合理结论，以了解这些叙述在各种环境下造成的影响。

接触带来改变：两个世纪中关于性别和国民的叙述

我有意扩大了本书研究的时间框架，以便探讨各个历史时期的差异和连续性。本书主要关注的是 20 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战后时期群聚效应（critical mass）以及日益加深的美国影响和新殖民主义对于在港的美国公民来说是个转折点。在关于 1997 年香港回归的媒体报道中，香港的美国化就是众多热议的话题之一。虽然每位妇女可能从各自的跨文化接触经历中会获得迥然不同的结论，但仍有三个共同的问题出现。



首先，妇女的经历叙述使人们关注到美国国民认同的性别化形态。尽管关于国民的概念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而且每一位女性的自我感也反映了一整套的具体环境信息，但在亚洲，所有关于国民的概念都表现出“国民负担”的特点。许多人回国后开始讨论他们从文化接触中学到了什么。正如我曾指出的，所有这些妇女不管是在和香港的朋友还是在和“本土乡亲”交流时，总是流露出一种“说教的冲动”。这类叙述都是关于“教训”（把话题转回到我的那位日本友人的描述）中国人、或亚洲的其他西方人、或是那些仍在美国的人们。其次，虽然有些叙述会强化传统的国民认同观，但另一些叙述却借助于国民概念的各种隐喻来构建新的更为国际化、跨民族或全球化的视野。最后，这些女性的叙述还表明了不同国民女性形象——如中国、美国、英国——的概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她们自己 and 他人运用于不同的用途。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对自己有利，都会想当然地并滔滔不绝地谈论性别和国民的话题。

美国妇女于19世纪初开始来到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第1章，“‘美国女孩’三幕剧：19世纪澳门和香港的文化接触故事”，探讨了19世纪中国商贸界的多种美国妇女形象。20世纪许多地方的妇女都接受了“现代风格”，在她们不总是受欢迎的领域寻求自我独立和职业认可。在香港，中国妇女和西方妇女的交流因为在旅游、教育和社会改革领域的共同兴趣而得到增长。她们发现彼此的生活都被战争改变了。第2章，“‘我身处战争中期，我正值事业中期’：女性、战争和国民身份认同”，集中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内战是如何为女性提供更多的职业机会和公共言论平台的，尤其是为那些选择单身或晚婚的女性。冷战期间，美国妇女是作为美国精神的步兵部署在香港的，这是为了对抗“丑陋的美国人”这一模式化形象，并为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美国势力提供支持。第3章，“‘美国的另一个声音’：冷战时期香港女性演绎的国民性”，探讨了在美国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势力日益影响香港及整个亚洲的背景下战后美国妇女和“美国化”妇女的形象模型。20世纪末香港快速发展成“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人们对于回归后的担忧。一方面导致了一波海外移民潮，另外也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在这一时期，美国妇女对于周遭的变化进行了反思，以多种方式为自己在“九七回归”后的香港挣得一席之地。第4章，“主权移交之家：跨国界时期温和的例外论”，探讨香港回归前后的几年关于性别、国民认同和说教的冲动等话题。



香港是“流动之地”

对于这次跨国界的美国研究项目来说，中国香港是个理想之地，因为正如伊丽莎白·辛恩（Elizabeth Sinn）所指出的，香港一直都是“中间地带”和“流动地带”¹⁷。本书女性的经历叙述记录了中国香港和美国的变迁，以及两者是如何发迹于世界的。香港处在三个帝国（首先是英国和中国，然后是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的边缘地带，具有复杂的身份认同——微观和宏观方面——的问题，这一令人着迷的位置正适合人们思考其全球背景下的国民身份问题。另外，近些年关于香港的非华人社群的各种学术研究也表明占多数的华人和前来工作和定居的“局外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卡洛琳·诺勒斯（Caroline Knowles）和道格拉斯·哈珀（Douglas Harper）在针对这些群体的一项独特调查中显示，“我们缺乏外国移民在异乡生活的详实记录……迁徙是关于旅行中的停留，也是关于停留中的旅行。停留（dwelling）把归属性和机动性联系起来了”¹⁸。

我要补充的是，很有必要结合不同历史时期来考察“停留”的概念。香港的历史在许多方面是跨国民的历史。在这个堪称全球化早期范例的地方，单个美国人和更为分散的美国化进程只是大融合现象的一部分。这些人的故事更加证实了约翰·卡罗尔（John Carroll）的观点，即香港应该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自身文化—历史的地方”，这里的华人资产阶级在1949年以前就早已具有港人的身份认同，尽管华裔和英裔精英们的社交圈仍是分开的¹⁹。卡罗尔呼吁人们应该“不仅仅只是进行理论批评或者为东方主义、底层研究和后殖民主义辩护”，并且还要开展“更多的既能涉及又能挑战这些方法的本土历史学研究”。我想，本书所探讨的妇女叙述可以作为这类本土历史学研究的重要知识来源²⁰。

在香港语境中使用“本地人”和“侨民”显示出一种流连于殖民往昔岁月的传统。正如杰森·沃迪（Jason Wordie）所说，这类表述有时候是颇为懒惰或含糊其辞的，其实就是指代“白人”和“华人”，往往排除甚至忽略了所有其他不属于这种二元分类的群体。“白人”和“华人”这类表述原先是用来阐释在政府或商业机构工作的条款，只是为了表明膳宿、津贴和其他类别的薪酬。沃迪提醒我们，“总是有一些欧洲人是按本地雇员条款被聘用的”²¹。如今，这类表述往往暗示着地位、种族和权力，掩盖了一些更为复杂的分裂和分歧。

那么国民身份的概念应该安插于各种分类和归属的何种地方呢？那些